



阿·茨維特科夫——
普羅斯維契斯基著

两次革命之间

(1907—1916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兩 次 革 命 之 間

(1907——1916 年)

阿·茨維特科夫—普羅斯維契斯基著

焦 桐 譯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1958年

А. В. ЦВЕТКОВ—ПРОСВЕЩЕНСКИЙ
МЕЖДУ ДВУМЯ РЕВОЛЮЦИЯМИ
(1907—1916 ГГ.)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1957

本書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7年

版本譯出

两次革命之間

(1907—1916年)

阿·茨維特科夫—普羅斯維申斯基著

魚 桐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編興1154號)

上海市印刷出版業局登記證出001號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开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張 6 5/8 字數 123,000

1958年5月第1版

1958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4,000

統一書号：11074·156

定 价：(7) 0.60 元

封面設計：趙 晴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老布尔什維克阿·茨維特科夫—普羅斯維契斯基在第一次俄国人民革命后，一直到二月革命这一段期間的回忆录。著者根据亲身的經歷叙述了布尔什維克彼得格勒党組織在当时的一些活动，詳細描述了沙皇俄国时代革命志士在監獄中的情况。最后著者又以极生动的笔調叙述了自己在西伯利亚流放，以及二月革命后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的一些情况。这本书是我們学习苏共党史的良好参考讀物。

作者的話

我的回忆录是回忆斯托雷平反动年代和 1912 年新的革命高漲时期彼得堡的革命工人运动的，当时受了打击的俄国无产阶级复原了，又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走上同沙皇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进行大规模斗争的道路了。

俄国无产阶级在这些年代的英勇斗争是与这些革命事件密切联系着的，因此俄国工人阶级在 1917 年 10 月成了胜利者。我一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就是这些斗争的参加者；如果我能在某种程度上对现今有关这个惊人时代的资料提供一些补充的话，那末我是很满意的。

本书的最后几章，是想叙述二月革命以前的那几年我在西伯利亚过的流放生活。

极大部分的回忆，已由参与各次事变和事件的同志们所证实。在写本书时，我参考了我手头所有的刊物和档案文件。

本书的个别几章，已用各种不同的题名在 1924 到 1930 年间发表了。比较完善的版本，是在 1933 年出版的。

现在这一版又经过相当的修改，补充了许多新的材料和文件。

阿·茨维特科夫—普罗斯维契斯基

目 录

作者的話

- 一 我的革命活动的开始。文化教育协会“教协”。
秘密小组。职工会…………… 1
- 二 布尔什維克的报纸“明星报”。第三届国家
杜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23
- 三 連納惨案和彼得堡对它的响应……………39
- 四 1912年彼得堡工人的五一示威游行……………44
- 五 第四届国家杜馬的选举。11月15日的
示威游行……………57
- 六 1913年的五一示威游行。逮捕。监狱……………69
- 七 在第四届国家杜馬旁听。社会民主党党团
的分裂……………83
- 八 奸細……………89
- 九 保險运动和伤病互助会……………95
- 十 第二次被捕。在候审室…………… 108
- 十一 工人运动的高漲。七月事件。战争的爆发…………… 119
- 十二 第三次被捕与流放西伯利亚…………… 135
- 十三 押解…………… 145
- 十四 伊尔基涅沃村…………… 163

十五	政治流刑犯合作总会·····	163
十六	流刑犯的成份·····	167
十七	流刑犯的逃跑·····	171
十八	流刑犯的生活問題·····	175
十九	西伯利亚大森林·····	181
二十	合作总会商店的成立·····	190
二一	关于革命的消息和从流放地启程·····	195
二二	康斯克——彼得格勒·····	202

一 我的革命活动的开始。文化教育协会“教协”。秘密小组。职工会

1907年,我还是一个16岁的孩子时,就在特威尔茨河岸的天桥作工,打桩。和我一道工作的人几乎全是所谓流氓无产者一类的人,他们最感兴趣的就是饮酒作乐。只要能赚到酒钱,什么工作条件都能答应,哪怕一天为四、五十个戈比工作到十一小时,得到工钱以后,许多人都“蹓跹”去了,而他们的位子便雇他们的另一些伙伴代替了。

在这一伙人当中,很少谈起1905年的革命,假定偶然有人谈起了,那么从这些流氓口里所听到的也只是对革命者和沙皇的谩骂。他们所以骂革命者,是因为革命者在翻天覆地的时代不许他们搶劫,而骂沙皇则是因为他样样不好。但是在反动政府屠杀时期,这些流氓却同便衣警察、偵探及“俄国人民协会”的会员们一齐加入了黑色百人团。

我常常亲眼看到这些作奸犯科的家伙在杀人以后的那种丑态。自然,向这班人是学不到一点好处的。我想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工人。

放工以后,我常到普罗哈洛夫斯基工厂的工人俱乐部去,那里经常有工人聚会。这个俱乐部是在1905年“自由”的日子里成立的,总算侥幸保存下来,没有被警察和黑色百

人团破坏。1905年革命时期，我父亲在这个工厂里作工，而我还完全是孩子的时候，就跟着母亲一道从乡下到这里来找他了。有一次，在一个阴雨天的深夜里，我看到彼得堡出来的几连哥薩克騎兵走过工厂区漆黑的街道去镇压罢工的工人。这是在1905年10月总罢工时候的事。我当时又怕又恨地盯着这些歪戴着帽子的彪形大汉——革命的刽子手。人們都說，哥薩克騎兵在工厂里拿皮鞭毒打工人，实际上在第二天真发生了这种事。这时，我想詳細地知道一下大約在两年以前发生过的这类事。

在普罗哈洛夫斯基工厂，我接近了1905年10月罢工时的几个积极的参加者。他們講的革命故事，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所以我便开始看書，希望能多知道一些革命斗争的事。

过了一个时期，我到一個玻璃制造厂当了一名正式工人，但不久我与我乡村小学时的一个同学帕·耶·斯米尔諾夫通信后，我就到喀琅施塔得去找他了。斯米尔諾夫曾因参加革命而被捕，释放后繼續在喀琅施塔得的港口担任事务所的职员。当时我父亲在梁布兴斯克工厂做工，我跟他商量一下后，他就放我走了，于是在1907年春天我在口袋里装了五个卢布就离开了天桥。

起初，由于斯米尔諾夫的幫助我在喀琅施塔得的港口当上了一名小工，每月掙16个卢布，过了一个时期我又在造船工程师那里“試驗”及格开始当上了造船的木匠，每日工資为1卢布30戈比。

当时喀琅施塔得扑灭革命的情形，还使人记忆犹新。喀琅施塔得的工人和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曾有两次掀起武装起义：一次在1905年10月，一次在1906年7月。在镇压他们的斗争中，沙皇政府利用了驻扎在喀琅施塔得要塞区的政治上最落后的陆军部队。

1906年的7月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在喀琅施塔得开始残酷屠杀起义的人。陆海军中的各级野蛮反动军官都以残暴而自矜。大批积极参加起义的人，被拖到喀琅施塔得要塞的周围，多半是被拖到芬兰湾北岸的狐鼻角枪毙或吊死了。喀琅施塔得的居民一直把这些地方当做革命战士的烈士墓。

狐鼻角被指定为屠场，这是因为它是一个森林蔽天、人烟稀少、与外界完全隔离的地方。沙皇的刽子手虽然已造成了一片镇压革命的反动气氛，但也怕人民的忿怒，所以就极秘密地屠杀革命战士。

极大多数的起义水兵，是在1906年下半年专制政体趁革命运动走向低潮而扑灭政治上不可靠的水兵的时候被屠杀的。

在喀琅施塔得本地也枪毙人，但枪毙以后是把尸首装在驳船上抛到大海里，或运到上述的那个狐鼻角或奥兰尼巴乌姆岸边挖一个大坑埋掉了。有时，借口押送起义军到那个海岸，也叫他们坐在这种驳船上，但及至到了大海里，却被预先敷设的水雷连船带人都炸沉到海底了。

由于喀琅施塔得是个海岛，同时要塞重地情况又特殊，

所以喀琅施塔得与俄国其他各地孤独地隔开。凡出入喀琅施塔得的人，都要受到严格的监视，旅客的行李和护照都要经过详细的检查。这一切就使喀琅施塔得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困难。同时沙皇政府又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与“暴徒”斗争。他们散发了黑色百人团的许多传单和小册子，教会也出来帮凶。1907年，当时安得烈也夫大教堂的一个有名的司祭长、黑色百人团团员伊奥尼·喀琅施塔茨基到这里进行活动。他在举行“隆重的礼拜”时宣传屠杀。勾结在他周围的有全城的黑色百人团分子。有时，他做“礼拜”和“布道”时还把从乡下出来刚找到工作的码头工人引诱进来。这类工人与正式无产者不同，脑子里充满了宗教迷信。

在这满目凄凉的景象中，青年工人表现出他们的革命热情，他们经常谈论1905年斗争中特别惊险动人的故事和革命英雄们的事迹，唱这一类的歌曲。当时流行的曲子，是歌颂海军上尉施米特领导的黑海水兵起义的事迹。最风行的是讽刺1905年10月17日宣言的歌曲（在这个曲子里有这样的话：“尼古拉第二雄赳赳，颁发诏书满天走；双手扼死自由，活的一个不留”）和开头是这么两句话的一个曲子：“全俄的皇帝，宪兵和侦探的沙皇，沙皇刽子手，奸细，酒店老板……”以及其他曲子。歌颂莫斯科12月武装起义和1905年革命中其他事件的曲子也有。有的曲子是暴露神父的说谎和欺骗的，比如在“神父和魔鬼”的歌中就是这样。在这首歌里，说到神父怎样用“地狱”来恐吓不服从政府的工人，也说到魔鬼听了这种说教后怎样拖着神父到了这么一个工

厂：“百丈的高爐紅光閃閃，鬼火直冲天，千斤的鉄錘隆声連連，火花象噴泉，无数的工人被濺滿一身。这时魔鬼向神父說：看吧，这就是資本家从工人身上榨取最后一滴血汗的地獄。”这个实质上是原始的歌曲，对于当时暴露宗教对群众的欺騙有很大的意义。

在上述的这个黑暗反动年代，喀琅施塔得的地下革命工作做得很差。青年工人是听了过去革命的故事和歌曲才懂得革命的道理并受到教育的。但只有革命的歌曲和故事是不能滿足我們的。我們要寻求一条在实际工作中發揮自己力量的道路。在碼頭工人中产生了組織革命小組的思想，但由于几个最积极的同志走了，小組沒有組織成功。

1908年初，港口上决定解雇一千多个工人，我也在被解雇之列，所以我到了彼得堡。

我开始找工作了，只过了一个月，就找到了，我在彼得堡港口做了一名安装軍艦的助手。我的叔父，彼得堡的老工人格·姆·凡察戈夫也在这里当安装匠(工长)。

人烟稠密的彼得堡与冷落寂靜的喀琅施塔得完全不同。虽然在工人当中有反动和消沉的情緒，但这里究竟燃起了革命的火花。当时在彼得堡有12个工人文化教育协会，或所謂工人俱乐部，有几个工会，在这些团体里也尽可能地進行着革命工作。

这些革命团体散布在全城：在市区有斯达修列維奇^①

① 姆·姆·斯达修列維奇(1826—1911年)——自由主义的政論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俱乐部、“妇女互助会”、印刷工人音乐戏剧教育小组；在科洛敏斯克区有“教育”协会；在纳尔维区有纳尔维区教育协会；在涅夫斯克区有“光明”俱乐部；在莫斯科关卡有“教育”协会；在彼得堡那面^①有“知识”俱乐部；在华西里耶夫斯克岛有“光明和知识之源”；在维堡区有沙普索尼耶夫斯克教育协会；在沙洲有“科学”协会；在奥布霍夫工厂区有“知识—光明会”、涅克拉索夫教育协会等。其中有些是从1905年保存下来的，有些是在1907年和以后根据沙皇政府在革命的压力下于1906年3月4日所颁布的集会结社暂行法令而成立的。

这些协会活动的范围，由于受到警察的多次阻挠而大受限制，凡是“对社会的安宁和治安有威胁的”活动，一律禁止。全体大会每次只能在市长特别批准和警察（警察分局长或巡官）一定在场的条件下召开。

这类工人文化教育协会和工会在俄国其他城市和工业区的某些地方也有，但是它们都受到警察的摧残，不可能充分地开展工作。

从1905年到1914年的这一段时期内，这些“合法的”工人组织，如文化教育协会或所谓工人俱乐部、夜校、工会以及后来的伤病互助会都有很大的意义。的确，在伤病互助会的理事会中有工厂主的代表，但工厂中的这些伤病互助会究竟是工人的基层组织。党组织在这些组织的掩护

^① 彼得堡那面是一个地名，如上海的浦东，下同此——译者。

下进行了革命工作，从这些組織的工人当中吸收了新的党员。这些合法的組織虽受了警察的摧殘，但在反动时代中，在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工人运动方面，起了极大的組織教育作用。

1908年5月，在一个工人文化教育协会即1907年成立的“教育”协会的全体大会上我被吸收为该会的会员。这个协会的会址設在科洛敏斯克区的一条偏僻的工厂街上，与法俄工厂和彼得堡港口相距不远；房子很小，是从一个房东手里以每月45个卢布租下来的。

虽然协会設在工人区，但它的会员那时还未超过100人。其中有些人，主要是法俄工厂和彼得堡港口的工人，虽在1904和1905年初还是加邦組織的会员，但在1905年1月9日以后就参加社会民主党了。

工人们不大关心协会的活动，很少到会里来。但是在酒店和小飯館里，直到深夜还挤满了老工人和青年。特别是在节日里，在小飯館附近的街道上，常常发生吵嘴和打架的事情。工人们的老婆常常手里抱着孩子站在馬路的角落里等候她們喝醉酒的丈夫回去。

那时孟什維克在“教协”中占着优势，事实上他們包办了协会的一切领导工作。布尔什維克在这里总共只有几个人，其中有阿·莫·皮列科和皮·莫·阿法納森科这几个人，后来我和他們都建立了亲密的友誼。同布尔什維克一道工作的，还有我小时候的同学斯米尔諾夫，那时他已从喀琅施塔得来到彼得堡了。在协会的会员当中，还有一小部分党

悟的青年工人是跟着布尔什維克走的。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臭名昭著的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悲伤“信条”的作者之一庫斯考娃常来协会。她总是罩着面紗，衣着清雅庄丽。不論談話或在大会上講演，她的一举一動都显露出了十足的紳士派头，矯揉做作，非常驕傲，所以会里富于革命热情的一部分會員都远远的躲开她。但孟什維克却認為她是他們崇拜的偶象，对她非常殷勤，她在他們之間，博得了很大的威信。

在这个时期，“教协”已显著地展开了它的工作。晚間常常举行普及教育講座。为了補助經費，曾經举行过募捐講演会和游艺会，这些也帮助我們加强了工人之間的联系。在这些講演会和游艺会上，社会民主党第三届国家杜馬的党团往往也全体出席。他們利用各种政治題目給最可靠的會員們秘密地做报告和学术講演。但在举行这些會議的时候，在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总是发生激烈的爭論。有时社会革命党在爭論时也参加了，尽管他們永远是少数的几个人，而且在有組織的工人当中不起什么作用。往往警察接到暗探和奸細的告密后，就突然派大队人馬闖进来搜查，把到会人們的姓名一一登記下来后成批地帶到分局进行“身份調查”。如在到会的人們当中发现有党的秘密工作者，則立即逮捕，关到監獄中去。

工人文化教育协会因經費不足，常常弄得一筹莫展。在这种情况下，工会总是出来帮忙，但因工会自身在經濟上也很拮据，所以不得不常常另找別的办法。如在1908年，我

們协会因为长期繳不起房租而被房东逼着搬家时，就是利用會員們自由捐助的 50 个卢布才繳了房租的。但是方式不只这一些。我們曾經派一个會員去請有名的历史学家莫·莫·柯瓦列夫斯基教授給我們担任一次募捐的講演。柯瓦列夫斯基同意了。他选定了这么一个題目“卡尔·馬克思和斯宾塞”。因为柯瓦列夫斯基去过馬克思家里許多次，所以他时时談起他自己的印象，把世界无产階級偉大导师的生活告訴給听众。为使在場的警察分局长不注意起見，他滑稽地講到各种瑣細的事情，比如他有一次到馬克思家里时，馬克思的夫人还請他吃美味的肉包子等等。这次講演收到 250 个卢布，因此严重的經濟危机暂时得到克服了。

为使彼得堡各工人俱乐部的活动取得联系、互助和配合起見，成立了俱乐部的聯絡委員會。为了这一目的，在委員會成立不久以前已成立了工会的联合会，或所謂总办事处。当然，俱乐部的聯絡委員會和总办事处都是秘密的，因为这些組織的任何联合在当时都是被禁止的。参加这些組織的同志都有被逮捕和被流放的危險。

然而尽管有这些迫害，党組織还是巧妙地利用了工会和文化教育协会。无怪彼得堡暗探局在給警察厅的一份报告中称这些組織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員會的輔助机构”。暗探局在这份有趣的报告中訴苦說，发现党委会开会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些會議是打着文教团体或俱乐部理事会會議的名义来进行的。为了能够討論党的問題，参加會議的人都想尽了各种巧妙的办法：在約定的時間以前

开会，在講演时趁人們把警长領到食品部的机会决定党的問題；收买戶籍人員等等。

在斯托雷平反动的黑暗时代，彼得堡是社会政治生活非常活跃的中心。在1908年和1910年之間的这一段时期內，在这里召开过各种代表大会，如人民大学代表大会、妇女代表大会和戒酒代表大会。在这些代表大会上也邀請工人文化教育团体的代表参加，而在某些代表大会上甚至还邀請工会派代表出席。在代表大会會議期間，工人代表总是要同参加大会的一部分自由主义者和一部分黑色百人团所凑成的多数进行論战。

我曾經当过戒酒代表大会的工人代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大部分的人是戒酒协会和其他宗教慈善机关的代表。大会上有许多神父，他們建議“用宗教治疗人民所中的毒”。我們的代表对資产階級黑色百人团的这些听众表明，关于酗酒的問題是与現存的警察殘暴制度密切联系着的，在这种制度下，即使工人組織提倡的一切文化生活是以劝导工人戒酒为目的，然而也都会遭到有产階級政权方面的各种反对。所以我們宣称必須号召工人階級用一切力量首先与这种制度作斗争。当然，这些话是在公开的場合講的，所以工人的代表不得不避免用“刺激的話”。但这些话还是使代表大会上的一部分資产階級黑色百人团听了头痛。因此，一会儿警察来了，暗探局的偵探也手忙脚乱起来了。以后两天的夜里，便有許多工人代表被捕或被驅逐出彼得堡。

1908年秋天，“教协”的几个會員菲奥道尔·伏洛什尼